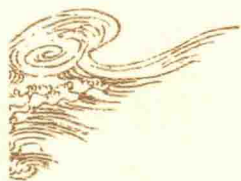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

杜甫全集校注



【七】

主 編 ◆ 蕭滌非

全書終審統稿 ◆ 張忠綱

副 主 編 ◆ 廖仲安 張忠綱

鄭慶篤 焦裕銀

李 華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

杜甫全集校注

主 編 ◆ 蕭滌非

全書終審統稿 ◆ 張忠綱

副 主 編 ◆ 廖仲安

鄭慶篤 焦裕銀

李 華

【七】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杜甫全集校注:全12冊/蕭滌非主編.—北京:人民文學出版社,2013
ISBN 978-7-02-009519-3

I. ①杜… II. ①蕭… III. ①杜甫(712~770)—全集 IV. ①I214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229659 號

本書為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

責任編輯 葛雲波 胡文駿

徐文凱 李俊

裝幀設計 劉靜

責任印製 李博

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166號

郵政編碼 100705

網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刷 三河市鑫金馬印裝有限公司

經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

字數 6800千字

開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張 231.375 插頁 24

印數 1—4000

版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書號 978-7-02-009519-3

定價 850.00圓(全十二冊)
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。電話:01065233595

前 言

盛唐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的鼎盛時期。其間大家雲集，傑作紛呈。李白、杜甫、王維、孟浩然、高適、岑參諸人一時並出，開宗立派，爭奇鬪勝，如諸峯並峙，列宿爭輝。這一年輩不齊，而相互各有交往的詩人群體，所取得之輝煌成就，可謂登峯造極。而此群體中杜甫又以其渾涵汪洋、沈鬱頓挫、律切精深、無體不工的詩章，熔鑄古今，集其大成的創作成就，被後代推為一位劃時代的偉大詩人。

杜甫及其詩歌之出現，當與其所處之歷史條件及文學淵源密切相關。開元治世是唐朝封建社會發展的頂點，政治昌明，經濟富庶，社會安定，文化繁榮，思想活躍，中外經濟文化之交流空前頻繁，人的精神面貌昂揚樂觀。杜甫《憶昔》詩中有如是描述：「憶昔開元全盛日，小邑猶藏萬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倉廩俱豐實。九州道路無豺虎，遠行不勞吉日出。齊紈魯縞車班班，男耕女桑不相失。」與此同時，也潛伏着複雜的社會危機。天寶末年的安史之亂，則是唐朝極盛而衰之轉折點，各種社會矛盾的總爆發，其來勢突兀，形勢急轉直下，兩京陷落，玄宗奔蜀，胡逆稱帝，民墜塗炭，天下大亂，持續八年之久，造成整個社會大破壞。史載：天寶十三載（七五四），全國戶數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，人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，有唐戶口，盛極於此。經過戰亂，至廣

德二年（七六四），全國戶數僅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，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二萬三百八十六，十年之間，銳減三分之二以上。雖數計未盡精確，亦足見災難之深重。戶口銳減，而民衆之賦斂却愈益加劇。《資治通鑑·唐肅宗寶應元年》（七六一）載：「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，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，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，計其大數而徵之。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，不問負之有無，貲之高下，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，籍其所有而中分之，甚者什取八九，謂之白著。有不服者，嚴刑以威之。民有蓄穀十斛者，則重足以待命。或相聚山澤爲群盜，州縣不能制。」如此史籍所罕見之橫徵暴斂、豪奪強取，終至官逼民反，加重了社會危機。安史之亂不僅對李唐王朝是一致命創傷，乃至對整個封建社會也有其更爲深遠之影響。這次巨變給人的精神面貌，亦造成一極大落差。杜甫詩歌植根於盛唐，然而經歷天寶亂後之種種變局，詩人又以關心現實、同情人民的政治熱情，身入下層，目及邊郡，大大拓寬了思想眼界和詩歌表現範圍，深刻而細緻地描繪了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，至晚唐時，已有『詩史』之美譽。中國古典詩歌，自先秦至漢、魏、六朝，四、五、七言形式已漸臻成熟，至初唐五、七言近體詩的定型，更標誌着我國詩歌在體裁上已達到豐富完備的歷史高度，給詩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豐富多采的創作形式。杜甫詩歌創作能及時地利用這些形式，達到諸體皆備，無體不工，繼承傳統而又刻意求新，使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，與其藝術形式達到高度的完美統一，爲歷代詩家文人所推崇取法。在我國詩史上，詩人杜甫的確是起到了集前代之大成，開後世之先路的鉅大作用。

一

杜甫字子美，唐玄宗先天元年（七一二）生於鞏縣（今河南鞏義）。其十三世祖杜預，爲京兆杜陵人，故杜甫常自稱『杜陵野老』、『杜陵布衣』。杜預爲西晉鎮南大將軍，封當陽侯，又是著名學者，精於《春秋左氏傳》，所著《春秋左氏經傳集解》爲今存最早之注本。其文治武功，杜甫每引以爲榮，並以之爲建功立言之楷模。十世祖遜，東晉時渡江南遷，居襄陽，故唐書本傳又稱甫爲襄陽（今屬湖北）人。曾祖依藝，官鞏縣令。祖審言，高宗總章三年（六七〇）進士，以詩見重於武后，官膳部員外郎，與時人李嶠、崔融、蘇味道並稱『文章四友』，於初唐五、七言律詩之創作有所貢獻（一），故甫嘗云：『吾祖詩冠古』（《贈蜀僧間丘師兄》），對這一詩人家世更引以自豪。父閑，歷官武功縣尉、奉天令、兗州司馬。杜甫家族門第觀念甚強，曾向玄宗表白：『自先君恕、預以降，奉儒守官，未墜素業。』（《進鵬賦表》）甫母崔氏，爲清河崔氏，亦是名門望族，詩中屢屢道及：『舅氏多人物，無慚困翮垂。』（《贈崔十三評事公輔》）『諸舅剖符近，開緘書札光。』（《人衡州》）『賢良歸盛族，吾舅盡知名。』（《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》）杜甫之家世出身、社會關係，對其一生政治態度、思想意識、生活環境、詩歌創作諸方面都產生很大影響。

杜甫一生歷經玄宗、肅宗、代宗三朝，李唐王朝極盛而衰，安史之亂是一分界。開元、天寶凡四十四年，玄宗後期，在政治、經濟、軍事諸多方面，雖矛盾重重，但仍不失爲太平。杜甫既經歷過繁

「榮昌盛的『開元全盛日』，也親身遭遇『流血川原丹』之安史之亂。安史亂後，唐王朝雖號稱中興，實則一蹶不振，江河日下。杜甫一生及其詩作，與其所處時代，特別是後期『萬方多難』的現實息息相關。依據當時社會形勢，自身實際及詩歌創作，杜甫一生大體可分六個階段。

一、讀書漫遊時期。時值大唐王朝鼎盛時期，海內晏安，民殷國富，豪邁壯闊、奮發向上之時代精神激勵人心。青年士子更是壯志凌雲，意氣風發，對仕進前程充滿信心。杜甫幼年聰穎好學，具有詩人天賦。『七齡思即壯，開口詠鳳凰』（《壯遊》），可知其作詩起步甚早。到少年時代，更勤奮攻讀，廣學博覽，於經史百家、歷代詩文無所不讀，所謂『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』（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》），正是他親身的寶貴體驗。杜甫幼年時曾寄居於洛陽建春門內仁風里二姑母家。洛陽是唐代第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，所以他早年就『出遊翰墨場』（《壯遊》），認識了官至刺史的崔尚、魏啟心等前輩，得到他們的稱贊和鼓勵，又受到各種藝術之薰陶：於岐王宅裏聆聽大音樂家李龜年的歌唱，又在鄆城欣賞女舞蹈家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，後來還看到大書法家草聖張旭的書法。這些經歷，使詩人具有了多方面的藝術修養。少年時代之杜甫亦非傳統的文弱書生，『憶年十五心尚孩，健如黃犢走復來。庭前八月梨棗熟，一日上樹能千回』（《百憂集行》），勾畫出少年杜甫活潑好動的課餘生活側面。

唐代詩家文人應試之前，喜好漫遊，以開拓視野，閱歷人生，廣交朋友，增長才識。同時藉以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，即今人所謂提高知名度，以為科舉應試之準備。開元十八年（七三〇），年將弱冠的杜甫即開始漫遊各地。先是遊晉，至郇瑕（今山西臨猗），結識韋之晉、寇錫等人。繼於次年南

游吳越：「東下姑蘇臺，已具浮海航。到今有遺恨，不得窮扶桑。王謝風流遠，闔閭丘墓荒。劍池石壁仄，長洲芰荷香。嵯峨閭門北，清廟映迴塘。」『枕戈憶勾踐，渡浙想秦皇。越女天下白，鑑湖五月涼。剡溪蘊秀異，欲罷不能忘。』（《壯遊》）歷時數年，遍覽江南山水、列朝名勝古跡，對生長於中原之杜甫而言，無疑是終生難忘之一段浪漫生活。開元二十四年（七三六），杜甫在洛陽應進士試，在許多考生反對考功郎中主試風潮之中，得一「忤下考功第」（《壯遊》）之結果，隨即遊歷齊、趙，與蘇源明等「放蕩齊趙間，裘馬頗清狂。春歌叢臺上，冬獵青丘旁。呼鷹皂櫪林，逐獸雲雪岡。射飛曾縱鞚，引臂落驚鷗。」（《壯遊》）。天寶三載（七四四）四月，在洛陽與李白相識，兩人一見如故，相邀同遊梁宋。時高適亦流寓梁園，三位詩人情趣契合，「憶與高李輩，論交人酒壚。兩公壯藻思，得我色敷腴。氣酣登吹臺，懷古視平蕪」（《遣懷》），一同登高懷古，訪道尋幽，豪飲射獵，賦詩論文。三人之交情在詩情之互相交流、詩才之互相激賞中自然形成，而不以地位、勢利為條件。次年秋，李白、杜甫於兗州分手，甫有《贈李白》，太白亦作《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》，相互贈別。此後，這一對詩壇摯友就「飛蓬各自遠」（李白《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》），一直未再見面。

這一時期年月雖長，而存詩甚少，不到三十首，多係五言古體和五律。子美於天寶十三載，四十歲時所寫之《進鵬賦表》中自稱：「自七歲所綴詩筆，向四十載矣，約千有餘篇。」照此數估算，則其三十四歲以前之詩作，至少也應有三四百首，而遺留至今者却如此之少，原因何在呢？可能是杜甫步入晚年之後，詩歌更臻爐火純青，思想境界既高，藝術要求亦更精，對自己早年之作，有所選擇刪汰。況安史亂後，四方奔走，早年之作，亦難免散失。杜甫早期詩作，存世者雖為數甚少，然而

其中《望嶽》、《房兵曹胡馬》、《畫鷹》、《夜宴左氏莊》諸作，抒懷詠志，摹景狀物，皆氣勢恢宏，語言警拔，已顯示出青年詩人英姿勃發，霜刃初試之豪邁精神。

二、長安困頓十年。天寶五載，杜甫三十五歲，滿懷「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淳」之政治熱情，自洛陽來到長安。次年，玄宗「欲廣求天下之士，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」（二）。杜甫亦應此制舉，而右相李林甫嫉賢妒才，蒙上欺下，「既而至者皆試以詩、賦、論，遂無一人及第者。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」（三）。杜甫於《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》中說：「破膽遭前政，陰謀獨秉鈞。微生霜忌刻，萬事益酸辛。」這正是他困守長安，四處碰壁的開始。此後他又投詩干謁達官顯貴，以期汲引，並獻賦朝廷，企求得到玄宗青睞，亦未遂願。唯天寶十載正月，玄宗舉行祭祀大典，詩人於九載冬預獻《三大禮賦》，却意外得到玄宗賞識。此事，杜甫曾屢屢道及，《壯遊》詩云：「天子廢食召，群公會軒裳。」《莫相疑行》寫得更為具體：「憶獻三賦蓬萊宮，自怪一日聲烜赫。集賢學士如堵牆，觀我落筆中書堂。」很是風光了一番。但此舉只博得個「詞感帝王尊」（《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》）而已。李白以詩名，僅得供奉翰林，而杜甫獻賦，更是只獲得「送隸有司，參列選序」的候補資格。

帝都長安是唐朝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，宮室壯麗，經濟繁榮，交通發達，商賈雲集，文人薈萃，思想活躍。杜甫於此廣交朋友，賦詩唱和，宴集會飲，登慈恩寺塔，遊賞曲江池、昆明池、樂遊園、漢陂、丈八溝、何將軍山林諸風景勝地、私家別墅，得以認識上層社會生活，視野更加開闊，對其詩作自有助益，生活亦不乏愜意之趣。然而，「長安米貴，居大不易」，漫長十年中，備嘗艱辛屈辱。生活寥落，諸事求人，不斷過着「賣藥都市，寄食友朋」（《進三大禮賦表》）之悽苦生活。從

一個裘馬輕狂、才華橫溢的宦門公子，落到『朝扣富兒門，暮隨肥馬塵。殘杯與冷炙，到處潛悲辛』（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》），受社會冷落，遭人白眼的境遇之中，其令人難以忍受，可想而知。但是，杜甫正是在『飢臥動即向一句，敝衣何啻聯百結』（《投簡咸華兩縣諸子》）之艱難遭際中，對社會的觀察力不斷提高。與高適、岑參、儲光義、薛據等人同登慈恩寺塔時所寫之『秦山忽破碎，涇渭不可求。俯視但一氣，焉能辨皇州』，就是詩人高瞻遠矚，透過表面安定繁榮之社會現象，預感到潛伏之社會危機。接着又寫了《麗人行》，揭露楊國忠兄妹荒淫奢侈；寫了《兵車行》，揭露唐玄宗窮兵黷武不恤民隱。最後更唱出『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』（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）這震撼千古之名句。

天寶十四載十月，杜甫於長安困頓十年之久，才被授為河西尉，不就，旋改右衛率府兵曹參軍。杜甫對此職亦不以為意，有《官定後戲贈》詩自嘲。『昔罷河西尉，初興薊北師』（《夔府書懷四十韻》），杜甫始任官職之時，幾乎就是安祿山造反之日了。

杜甫長安十年坎坷落拓，雖殘杯冷炙，衣食不繼，其個性亦浪漫不羈。有時在咸陽客舍『相與博塞為歡娛』（《今夕行》）。有時在何將軍山林『醒酒微風入，聽詩靜夜分』，『自笑燈前舞，誰憐醉後歌』（《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》）。甚至酒後漫語『儒術於我何有哉？孔丘盜跖俱塵埃』（《醉時歌》），發英雄屯蹇之憤慨激言，與太白『古來聖賢皆寂寞，惟有飲者留其名』（《將進酒》），堪稱同調。杜甫之詩酒風流，倜儻豪放，有時並不亞於其詩友李白。

這一時期僅存詩百首左右，內容題材較前擴大，體裁仍以五七言古為主，其中七言古詩有二十六

首之多，足見其藝術上已有較大進展。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這首五古長篇更可作為十年長安生活之總結，述生平，擴鬱結，寫胸臆，揭時弊，雄奇蒼茫，沈鬱頓挫，尤為集中之大文章。

三、戰亂初起，顛沛流離時期。此指安史之亂爆發，至杜甫入蜀以前，即戰亂最激烈之四年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，安史之亂爆發，李唐王朝百年太平，毫無預防，朝野上下對這場動亂都驚惶失措。十二月洛陽失守，次年正月安祿山僭位稱帝，偽號大燕，繼續進逼長安。六月九日潼關失守，十二日玄宗倉惶奔蜀，行至馬嵬，留太子李亨東向討賊。長安遂陷落。急遽動亂中杜甫携家小先由奉先往白水，繼向陝北流亡。『野果充糗糧，卑枝成屋椽。』（《彭衙行》）風餐露宿，和逃難人衆一起顛沛流離。七月十三日，李亨即位於靈武（今屬寧夏），是為肅宗，改元至德。是時甫全家已逃至鄜州（今陝西富縣），八月始得此消息，即隻身羸服投奔靈武，不料中途為叛軍所俘，而帶回長安。詩人面對國破家亡，逆胡跋扈，觸目心驚，寫下了《月夜》、《悲陳陶》、《悲青坂》、《對雪》、《哀王孫》、《哀江頭》、《春望》諸詩。至德二載（七五七）四月，杜甫始從長安逃歸鳳翔（今屬陝西）肅宗行在。『所親驚老瘦，辛苦賊中來』，『生還今日事，問道暫時人』，『死去憑誰報，歸來始自憐』（《喜達行在所三首》），寫途中危急九死一生之情狀，惻惻動人。『麻鞋見天子，衣袖露兩肘』（《述懷》），正是詩人初見肅宗時狼狽草率的真實寫照。肅宗任杜甫為左拾遺。左拾遺品位雖低，却是皇帝左右之諫官近臣，且唐代不乏由拾遺、補闕昇遷至相位者。於甫心目之中，此官正是實現其『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淳』（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》）之理想職位。惜就職不久，即因上疏諫止房琯之罷相，而觸怒肅宗，詔三司推問。房琯乃玄宗流亡蜀川途中親自任命之宰相，又奉冊靈武，留相肅宗。《舊唐

書·房瑄傳》謂其「自負其才，以天下爲己任。時行在軍務，多決之於瑄。凡有大事，諸將無敢預言」。後肅宗受賀蘭進明讒言，借故貶爲太子少師。杜甫認爲房瑄「少自樹立，晚爲醇儒，有大臣體」（《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》）。所謂「有大臣體」，即謂其能以直道匡君，有古大臣與君王「和而不同」之政治風度。不能因小過而免其宰相之職。後幸得張鎰、韋陟從中援救，始免於罪。是年閏八月，詔許回鄜州探家，實爲有意之疏遠。仕途之坎坷，却給詩人帶來創作之豐收，被譽爲詩史之長篇鉅製《北征》，以及《羌村三首》，即爲此時所作。九月，長安收復。十月，杜甫還鳳翔，扈從還京，仍充左拾遺，恪盡職守。「不寢聽金鑰，因風想玉珂。明朝有封事，數問夜如何？」（《春宿左省》）乾元元年（七五八）六月，房瑄貶邠州刺史。前祭酒劉秩、京兆少尹嚴武，皆坐與瑄交，分別貶爲閬州刺史、巴州刺史。杜甫亦因事涉房瑄，出爲華州司功參軍，唯以官小未載於史冊。「無才日衰老，駐馬望千門。」（《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》）詩人心情抑鬱不平，又不勝留戀。這次離開長安，雖終生企望一返，却至死未能如願。

諫臣生涯使杜甫對上層政治有了深切認識，覺察原先之理想信念過於天真，與現實之距離過於遙遠，從政熱情已漸異於昔時。但對於國家命運，戰爭局勢，依然十分關注。是年七月，於華州任所有《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》，分析敵我雙方形勢，主張渡河北進，直搗叛軍巢穴。審時度勢，頗有見地。安西李嗣業領北庭四鎮之兵，出華州赴關中待命，杜甫觀兵過境，喜而賦詩：「四鎮富精銳，摧鋒皆絕倫。還聞獻士卒，足以靜風塵。」「奇兵不在衆，萬馬救中原。談笑無河北，心肝奉至尊。」（《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》）對戰爭前景充滿信心。八月，肅宗以郭子儀、李光弼等九

節度使將軍二十萬討安慶緒。十一月，郭子儀等包圍鄴城，而「上以子儀、光弼皆元勳，難相統屬，故不置元帥，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」（《資治通鑑·唐肅宗乾元元年》）。杜甫對此深以爲慮。當李嗣業軍方赴討時，又作《觀兵》詩，明確提出「莫守鄴城下，斬鯨遼海波」。言當直搗范陽，傾思明之老巢，則彼將自顧不暇，援兵絕而鄴城可拔，不宜圍困鄴城老師乏饋。老杜見解與李光弼在前綫曾請求分兵打擊史思明援軍之謀略相似，而魚朝恩拒光弼之議。次年三月，九節度之六十萬官軍潰敗於鄴城，形勢急轉直下，東京震動，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、鄧。杜甫也於此時返回華州，沿途目睹征兵拉夫帶給人民的深重災難，也看到人民在國家十分危急時期，不惜自我犧牲之精神，寫下了『三吏』、『三別』等詩史名篇。詩人於繫心國家命運，同情民人疾苦之同時，內心深處還有更爲複雜之殷痛，由諫官貶爲華州司功，自己對時局之見解，因人微言輕，未被重視。鄴城一役如此慘敗，詩人百感交集，難以名狀。乾元二年七月，杜甫棄官，由華州赴秦州（今甘肅天水），十月又繼往同谷（今甘肅成縣），十二月又發同谷縣奔成都府。這年杜甫生活最爲艱辛，「奈何迫物累，一歲四行役」（《發同谷縣》），仕途蹇滯，流離播遷，飢寒交累，却使杜詩得到進一步昇華。

這一階段時僅四年，却正處於國家動蕩，個人生活亦急遽變化之中，詩人逃難、陷賊、奔赴行在、授職、遭貶、流離、輾轉起伏，飽經憂患。詩歌內容大爲充實。「曾爲掾吏趨三輔，憶在潼關詩興多。」（《峽中覽物》）杜甫從皇帝侍臣出爲州縣官吏，從宮廷步向民間，爲其詩歌開拓了廣闊的天地。近二百五十首詩中，深刻而全面地反映出戰亂年代的整個社會面貌。以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

百字》、《北征》、《洗兵馬》、《三吏》、《三別》爲代表，形成杜甫一生創作中的第一次高峰。稱杜詩爲「詩史」者，主要即指這一階段的作品。

杜甫棄官華州，當與朝廷人事變遷有關，故詩人時有被遺棄之感，士不遇知己，抱負無由施展，雖仍眷念朝廷，又輒以達者自擬，自解自慰，並開始流露隱逸田園之志，其《遣興》諸章，即甚明顯。此正表明詩人思想矛盾複雜，蘊含厚重深沉。從秦州到同谷，由同谷抵成都，杜甫於二十四首紀行詩中，寫出旅程艱險，山川百變，無論雄峯怒石、絕岸湍流之氣勢，崖寺古鎮、棧閣竹橋之風光，或役夫戍卒、篙師野人之形影，皆層出不窮，觸景生奇，詩人茹苦含辛，任重道遠之襟懷流露其間，可謂前無古人。

四、流寓兩川時期。這一時期自乾元二年（七五九）歲暮抵達成都起，到永泰元年（七六五）夏去蜀居夔州之前。四川號稱「天府之國」，經濟富庶，社會相對安定，是詩人心目中謀得溫飽的「樂土」。乾元二年末抵成都。次年，即上元元年春，在劍南西川節度使裴冕和一些親友的資助下，於西郊建成草堂。「錦里煙塵外，江村八九家」（《爲農》），「舍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見群鷗日日來」（《客至》），環境清幽靜謐，詩人種植花木，殖養家禽，又先後得到高適、嚴武的資助，生活與心境均比較平靜。「江山如有待，花柳更無私」（《後遊》），詩人欣賞着大自然之淳美情趣。「田父要皆去，鄰家問不違」（《寒食》），「眼前無俗物，多病也身輕」（《漫成二首》），他又慶幸自己能够和田父野老往來，遠離庸俗的官場。這個時期，他詩歌數量大增，懷念故鄉、懷念京華、憂國憂民之心，仍不斷在《茅屋爲秋風所破歌》、《大麥行》、《病橘》、《枯稷》等富有社會現實意義之篇章中湧

現出來。杜甫亦有暇思考探索詩歌創作及繼承、批評諸方面，寫成《戲爲六絕句》，以詩論文，實屬創體。

寶應元年（七六二）七月，新登位的代宗召回了部分被貶在外的前朝老臣，嚴武也在內。杜甫送嚴武到川北綿州的奉濟驛，並諄諄囑咐友人：「公若登台輔，臨危莫愛身。」（《奉送嚴公入朝十韻》）不料劍南兵馬使徐知道乘嚴武離蜀的時機，在成都作亂，杜甫遂先後流寓梓州（今四川三臺）、閬州（今四川閬中）。廣德元年（七六三）春，詩人在梓州喜聞延續八年的安史之亂終告平息，不禁驚喜欲狂，手舞足蹈，唱出平生第一首快詩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》，愛國激情真摯感人。廣德二年春，正計議買舟東下，得知嚴武再領兩川，並來函相邀，故於暮春携家返歸成都，再依嚴武。武奏爲節度參謀、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（後人因稱「杜工部」）。甫迫於友情，只好「白頭趨幕府」（《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》），「束縛酬知己，蹉跎效小忠」（《遣悶奉呈嚴公》）。永泰元年（七六五）正月，杜甫辭去幕職。四月，嚴武病逝。五月，杜甫離開成都乘舟南下（或說離蜀在嚴去世之前，證據不足）。『此生那老蜀，不死會歸秦。』（《奉送嚴公入朝十韻》）『主將歸調鼎，吾還訪舊邱。』（《立秋雨院中有作》）詩人一直思念返歸故里，現在終於結束了『五載客蜀郡，一年居梓州』（《去蜀》）的生活，沿江經嘉州（今四川樂山）、戎州（今四川宜賓）、渝州（今重慶）、忠州（今重慶忠縣），到雲安（今重慶雲陽）因病調養半年，然後往夔州（今重慶奉節）。杜甫在兩川凡六年，詩作近五百首，其中多爲五言律詩，七律亦漸增多。

五、寓居夔州時期。這一時期自大曆元年（七六六）暮春，至大曆三年正月出峽，近兩年時間。

夔州爲三峽起點，依山臨江，氣勢宏偉。白帝城俯視夔門，是一座控制險要地勢的歷史名城。杜甫在夔州，初寓山中客堂，秋移白帝城邊之西閣，次年春移居赤甲，暮春又遷居城西之瀼西，購置橘園四十畝，有『茅齋八九椽』（《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》），有『柴門擁樹向千株』（《寒雨朝行視園樹》）。後夔州都督柏茂琳請杜甫代管東屯之公田一百頃，便又遷至東屯。『稼穡分詩興，柴荆學土宜。』（《偶題》）『朝廷問府主，耕稼學山村。』（《晚》）詩人過起了田園農家生活，安定閒適中，得以大量寫詩，所謂『他鄉閱遲暮，不敢廢詩篇』（《歸》）是也。杜甫不僅將當時當地山川景物、名勝古迹、風土人情，以及個人諸多感觸鎔入詩篇，同時回憶往昔，從國家大事、個人身世、朋友交往許多方面都來一番反芻，寫下大量傳記體長篇，如《壯遊》、《昔遊》、《遣懷》、《往在》、《八哀》等。在藝術表現上，他自稱『晚節漸於詩律細』（《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》），尤其對七言律詩之內容、形式作了艱苦的探索和大膽的創新，大大拓寬了七律的題材範圍，詠古傷時，發議論、揭時弊，乃至表現日常生活細務瑣事，詩料無所不入，擴大到同古體詩同樣寬廣的程度。在形式上突破傳統，創造出拗格律詩，聲律對仗上突破舊軌，再創新規，聯章成組，刻意追求藝術上的完美。杜甫之七言律詩至此在藝術造詣上已達到至精至醇之境界。如《諸將五首》、《秋興八首》、《詠懷古跡五首》，思緒浩茫，包容宇宙，弔古傷今，慷慨淋漓，宏麗沉渾，律切精深。前人評之爲『乃公一 lifetime 神結聚之作』（四）。杜甫把律詩應用於日常生活，《又呈吳郎》即以詩代書札，開導吳郎，表現出對一孤寡老婦之深切同情。在夔州亦寫了不少具有強烈社會現實內容的古體詩。『道州憂黎庶，詞氣浩縱橫。』（《同元使君春陵行》）『征戍誅求寡妻哭，遠客中宵淚霑臆。』（《虎牙行》）杜甫始終未忘情

於人民。居夔不足兩年，却是杜詩豐收季節，多達四百三十餘首，可說是杜甫一生中創作的第二高峰。杜甫年愈老，詩愈多，藝益工。中年的博大，與老年的精深，遙遙相對。宋人呂大防考杜詩之「辭力」，有「少而銳、壯而肆、老而嚴」之說，確為有得之見。

六、漂泊荆湘時期。此指杜甫一生最後之三年。大曆三年春，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，適江陵，又開始了詩人垂暮之年的漂泊生涯。「老向巴人裏，今辭楚塞隅。人舟翻不樂，解纜獨長吁。」（《白帝城放船四十韻》）啟程之時，杜甫內心感觸頗紛雜。思歸急切而前路未卜。三月抵達江陵（今湖北荊州），是時，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而作叛，軍閥混戰，商州一帶大亂。「如何關塞阻，轉作瀟湘遊。」（《去蜀》）詩人原來設想過的「便下襄陽向洛陽」（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》）的道路梗阻了，只得轉公安（今屬湖北），年底到岳州（今湖南岳陽），詩人登上岳陽樓，極目煙波浩渺的洞庭湖水，心胸激昂蕩漾，寫下晚年名篇《登岳陽樓》詩，氣象闔放，涵蓄深遠，蒼涼悲壯，被後世譽為五律中千古絕調。

大曆四年春，杜甫繼續南行，經潭州（今湖南長沙），抵達衡州（今湖南衡陽），意欲投奔湖南觀察使韋之晉，豈料韋已移鎮潭州，並於四月間病故，詩人無所依藉，往返於衡、潭之間，漂泊一年之久。艱難漂泊之際，仍在著意觀察社會人生，詩筆不輟。

大曆五年四月，湖南兵馬使臧玠殺潭州刺史崔瓘，據潭作亂，杜甫又離開潭州逆湘水南行，欲往郴州（今屬湖南），依其舅氏錄事參軍崔偉，適遇江水遽漲，逆水上行十分艱難，小舟被阻於距耒陽（今屬湖南）四十里之方田驛，數日不得食，耒陽聶令聞訊饋送酒肉，真是雪中送炭，詩人一家方免